

19.06

张道隆



專輯

九



十
憶
舊

屈武題



第8輯

政协龙川县文史会
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七月

九十忆旧

张道隆

《龙川文史》专辑

（总第八辑）

政协龙川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作者近照)

育得桃李

滿天下

沒無芥蒂

在心懷

道改回士邪全

羅武

道隆 吾兄六鑒

來書敬悉

於卅大壽慶地慶祝迴憶抗日戰爭期間教育
生活共同甘苦

兄長惠州中學於河源藍口才隨李伯豪言

希茲校友生列隊江干歡迎往事回味不覺過
十年矣今知與

兄尚存澹泊生活所由來也書此致勉

黃麟書 五九九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五日

自序

行年七十，夙称古稀之年，盖叹人寿之难得也。而我今已九十岁了，超过古稀多矣，幸身体尚健，记忆力尚好，颇自庆幸，然亦不无感慨。

我出生于清光绪末年，在这几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经过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解放后的“反右”、“文革”运动，其间国际国内之风云变幻，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身历其中，怵目惊心。当时同学少年在经历种种磨炼中，或病死、战死、枉死、困死、老死、抑郁而死，凋残殆尽，而我仍然健存。往事历历，记忆犹新；雪泥鸿爪，亦自难忘。益觉幸存者的责任未了，宁不为人们留下一点可以回味的东西？

我从广东高师（中山大学）毕业后，即历任六间中学、师范学校校长，从事教育工作数十年。回忆起当年为教育事业忍辱负重，咬紧牙根，艰苦奋斗，又看到当年的同学们今天已养育成才，振作有为，禁不

住一时苦辣酸甜涌上心来，思绪万千，不能自己。其中有汗水、有果实、有伤痕、有欢笑，又非拙笔所能尽述。

虽然，我个人经历及工作，不过沧海一粟，而一得之愚，亦不无微小参考价值，乃遵友人之劝囑，写下这本回忆录。

在写作过程中蒙张克明、黄鸣东、陈辉佩、张鏊英、李永考、彭思翹、李貽杰、张秋中等同学友人为我提供材料，校正情书，付出劳力；彭思佐同学赞助全部出版费，龙川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协助编辑出版，谨此表示谢意。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名誉主席屈武同志亦年九十四岁了，为我题“九十忆旧”书名，并赠我一联，联曰：“育得桃李满天下，从无芥蒂在心怀。”寥寥数笔，却对我平生为人及工作，给予很大鼓励。最近，年高九十九岁的前广东教育厅厅长黄麟书先生从美国来书，对我慰勉有加，长辈的爱护，后辈的鼓

舞，将激发我继续发挥余热，为祖国统一事业贡献棉薄。在此，谨向屈武主席、黄麟书老先生以及所有关心爱护我的朋友、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是为序。

张道隆

于广州怡乐村

一九九一年三月

目 录

自序	(1)
一、 求学时代	(1)
我的童年	(1)
从小学到中学	(3)
革命高潮中的大学生活	(14)
二、 教育生涯	(26)
梅县乐育中学任教	(26)
龙川一中校长四年	(32)
海丰县立中学的回忆	(55)
重返梅县乐育中学	(61)
抗战时期的惠州中学	(67)
老隆师范三年	(78)
三、 参加老隆起义	(83)
四、 学习、工作与改造	(88)
参加民革工作	(88)
反右斗争以后	(94)

落实政策前后·····	(101)
五、离休后的香港之行·····	(107)

附 篇

川中校园生活杂忆·····	张克明 (115)
张道隆校长《龙川一中校长四年》 写作的前后·····	张鑑英等 (124)
海丰彭湃中学校长来信·····	(127)
忆车头山、秀水溪畔····· ——省立惠州中学·····	叶续源 (128)
读《九十忆旧》并呈张道隆校长二律 ·····	李貽杰 (137)
诗·····	陈培驥 (139)

一、求学时代

我的童年

我是龙川县仁里管理区乾里（原庄头村）人。一九〇一年三月十八日（光绪二十七年夏历十二月除夕酉时）出生。家名云魁，礼名道隆。

曾祖父名益谦，生祖父治邦（瑞祥）、叔祖父香祥二人。祖父生四子，长子裕松，次子南松（礼名贞守），三子林松，四子善松（贞初）。叔祖父生二子，长子彬松（化如），次子耀松。大伯父裕松年青病死无后。三叔父林松，只生二女。父亲南松生我兄弟四人。长子连魁，我居次，三弟秋魁，四弟经魁（少卿）。秋魁则过继我大舅父改名怀曾。母亲叶亚月通衢人，长住外祖父、母家，所以我兄弟都在通衢长大。四叔父善松（贞初）娶妻欧阳思和生有三子，长子锡魁，次子炳魁，三子达魁。

祖父是前清武秀才，因率学生赴惠州府考试，病死惠州寓中。后运柩还乡安葬，耗费浩大，因而家中日益贫困，父亲也因此年幼失学，随我外祖父在通衢街经营小生意谋生，我就是出生在通衢店中。

我外祖父家属小康，除自耕二十多亩田外，还在通衢街开有“裕昌”杂货店并经营酿酒、磨豆腐等生意，家务全由我母

亲料理。外祖父母对我母亲非常疼爱，并且非常信任，因她性情温和端庄，待人接物态度和藹可亲，深得邻里称赞，说她是难得的贤淑妇人。我两个舅母妯娌间不和，心存芥蒂，母亲每每居中调处公正合理，双方都不敢违背，所以外祖父母都不愿我母亲离开他的家庭，因家中一切大小事务谷物家用都由我母亲掌握处理，全家大小也佩服母亲处理家务公正无私。母亲除了家务外，暇时兼做绣花缝衣纺纱织布的工作，我们兄弟所用蚊帐、被单及衣服都是母亲亲手织缝的。正如“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写的一样。

我启蒙时是在舅舅叶蔚华的蒙馆上学的。他曾赴惠州考秀才，因名落孙山便在通衢街一间店里开设私塾招收学生十多人，教授四书五经，初上学则读“人之初”。我在舅父处私塾读了一年，辛亥革命前一年父亲就送我兄弟二人到鹤市石狗岭教会办的乐育小学读书。因距离家庭较远在学校寄宿，每星期六下午才能回家取米取菜。本来我们兄弟是住在外祖父家中，全靠外祖父母的养育，照理是不能送我们兄弟俩去乐育小学读书的。但父亲很重视我们兄弟的教育，因他亲身体会到自己没文化的痛苦，不管如何困难都要给我们上学。尤其是要送我们到教会办的乐育小学以图造就。因该校管教严格，是龙川最先开办的新式学堂（据崇真总会记载，该学堂开办于一八八七年）。

父亲仅读过一年私塾，但他有些聪明，记忆力很强，而且喜欢听人尤其是读书人的言谈。他记着很多成语、典故出处，古今名人的格言，富有口才，谈起话来，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不知底细的人，则以为他读过不少典籍，文化程度不低。他也经常引用名人格言来教导我们兄弟，勉励我们做好人，多做好

事。他常说：“苦心人天不负，有志者事竟成”“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宁人负我，我不负人”等来教育鼓励我们兄弟。他为人正直，好打抱不平，乡里、亲戚与人发生纠纷，都肯出来调解，主持公道，所以邻里也喜欢他，有人称他为不识字的“绅士”。

我叔父化如是同盟会员，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投身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前二年辞去古竹乐育中学教职，回到龙川通衢明新学校（原景韩书院）任教，进行革命工作。我父亲受到化如叔父的影响，革命热情很高。在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起义前，他就剪去了辫子，戴上“哈帽”，乡人都叫他为“番鬼”。当时没有辫子的，就是革命党人。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清政府追杀革命党人，母亲日夜不安，经常流泪，恐父亲有杀身之祸。那时叔父化如在明新学校任教，而我们又住在通衢外祖父家中。一天黄昏母亲偕我去明新学校见化如叔，哭着说父亲剪辫的危险，要叔父劝我父亲装假辫子掩人耳目，以免遭殃。叔父为了掩护革命工作，尚未剪辫。叔父对我母亲说，不要怕，将来大家都会剪辫子，我不久也会剪辫子的。

从小学到中学

父亲为了我兄弟接受新教育起见，不顾经济困难送我到鹤南石狗岭乐育小学读书。按外国教会的学制小学五年、高小三年，课程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体操、音乐、圣经等科，实行男女同校。龙川的女子入学读书最早的当推乐育小

学，是开龙川男女同校的先河。除家在附近的学生外，其他无论男女学生都在学校食宿，并设有女子教师指导管理女生。学校管教严格，纪律严明，大家都认真学习。晚饭后则可到校外山野间散步，或打球、游戏。我初入学时还留有辫子，早上起床要梳好辫子。辛亥革命成功后大家都感到高兴，纷纷要求剪辫子。我的辫子是请德国马牧师的厨伕仁里同乡张德球剪的。当时的旧思想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们剪了辫都将头发带返家中交给父母。

学堂里的教师有的是外国牧师，有的是本国教师。校中主持人都是外国牧师，有德国马约翰牧师、经提福牧师，瑞士的文德理牧师。经提福初来我国正在学习汉语读中文，很少上课。马牧师除讲圣经外还担任体操及一切体育活动，设有平行架和杠架等体操器材。文德理牧师是瑞士的足球选手，态度和藹可亲，但中国话讲得不好，提倡打足球，他自己掏腰包在香港买回足球多个，教授我们练习足球。每日晚饭后，即带学生到花园后面广场教我们踢足球。有时将年纪较大的或足球踢得好的分为两队进行比赛，学会了踢足球的被编为中锋或左右锋队员。当时在本县有足球活动的学校犹如凤毛麟角。

文德理牧师会游泳，夏季炎热时他率领一班学生到冯屋坝河中游泳，河边有一深潭约有四、五米深，禁止我们游过去。能游过去的，他也注意保护，以免发生危险。后来有一个姓李的同学私自游泳不幸溺毙，从此我们学生心存戒心，除非文牧师在场，否则就不敢去游泳。文牧师也购置垒球教我们练习，但我对垒球不感兴趣，很少练习。本地老师有罗秀谷、张达卿、黄惠南、张清山、徐旭真，另有一位刘老师忘了他的名字。张

老师、刘老师都是秀才出身，教我的语文。罗秀谷教我地理、历史及低班的语文、算术。他很严格，背书背不出来的、听写错误的、或算术习作错误的都会被打手掌，很少学生没有被他打过手掌的。乐育小学因是教会学堂，很重视宗教课程。读圣经、背圣经书，是我们学生最怕的课目。音乐课程也重视，每周有二节音乐课，而星期日礼拜天唱赞美诗尤为重要，所以学生都要学习唱诗。担任音乐的教师是徐旭真牧师，他擅长音乐，好唱诗歌。有高低音合唱队，有风琴伴奏，很受欢迎。

我在乐育小学读了三年。初时是第四班（现在是二年级），后来跳了一班。毕业那一年我们和张资增、张惠林等几个同学加入基督教会，受洗礼。我礼名张道隆，张惠林礼名张道林，张资增礼名张道成。以后，分道扬镳，各奔前途。

学校的系统编制是初小五年，高小三年，中学四年，神学院四年（有些二年制）。高小设在五华元坑，中学有二间，一设在紫金古竹中师学堂，一设在梅县乐育德文中学。张道林、张道成两位同学则升入五华元坑乐育高小学堂，我则因母亲逝世无力远出外县就读，只得到附近的龙川县立通衢小学就读（连魁兄先一年就读该校）。在母亲未逝世前，因我们兄弟日渐长大，不便再住在外祖父家中了，而仁里乾里又无房屋可以居住，只好在通衢城北门外叶屋买了四间房屋准备久住。我们兄弟二人走读明新学堂既方便又节省费用。大哥连魁时年十七岁，我十三岁，经魁弟才七岁。父亲体弱多病，又无正常职业，也没有本钱经营小生意，就靠过去典来的几亩田耕种维持生活。但人力缺乏，又无姊妹嫂嫂料理家务，家庭冷落不堪，迄今回忆，犹觉凄凉。寒假时我曾跟随舅母天未亮就到二十多华里外的秦岭鹰婆寨山中采割卤草，至下午一、二时才能回到家中。

自己不会束缚则由我舅母代为束缚，挑回家中以作燃料。我在明新学校读了一年，虽是走读，但有时搭住校内，勤奋学习，学业有很大进步。校长钟伯颜（雪香），语文老师张国祥，算术老师张炳卿，音乐老师廖岳生，体操老师黄茂真等。在班中我的年纪比较小，而最大的有张佩珊、张雨民等，他们都是二十多岁的人，读过很久的私塾，语文基础很好。但我的算术及各科在乐育小学有较好的基础，虽语文不及他们，但考试要计总分成绩的，每到学期考试时我总成绩最高，名列前茅。张雨民则居第二，张佩珊则居五、六名。第二学期入学编座位时，则按名次编坐，我则与张雨民共一书桌，一大一小惹人注目。

官立学堂招收的学生，大多数来自私塾。他们读过四书五经，古文基础好，都是作文科目占优胜的，各班语文优秀的学生很多。明新学堂前身景韩书院是在清末开办的。科举废除后，一九〇五年改为县立明新学堂。毕业的学生仍授予“秀才”的名位。戴红顶，穿官服。通衢城设有通衢衙门，是鹤市区（龙川县第三区）政治中心，而明新学堂是鹤市区最高学府。校舍宽广，内有文昌阁，周围房间二十余间作为宿舍，有空旷园地，课堂有四、五座，背有山岗，前后都有广场，可作课外活动场所，是一间良好的校舍。惟学堂管教不够严格，学生自由散漫，学习不用功。

一九一四年冬寒假，有旧乐育小学同学告知，教会在凹背（凹背福音堂）开办了乐育高小学校。我得父亲同意于一九一五年转学到该校高小二年就读。该校设在四周环山的山坡上，环境幽美，林木繁茂，距离人家约有一华里，同学都说我们的学堂象一间庵场。我们早晚都在山野间坐着读书，温习功课，实

在是一间很好的读书之所。杨复生任校长，教师有罗秀谷、杨舜琴、杨蔼然，传道师张福今。以前在鹤市福音堂学汉语及中文的德国教师经提福调到该校教授德语。杨复生学问很好，对学生要求严格又乐于跟学生接近，晚饭后经常与学生一齐遨游野外。有几个学生他特别喜爱，出入必偕，而张淑民是他最为喜爱的学生。我同班同学有张淑民（镜堂）、罗元英、黄榕增、邬家波、张鑑铭、杨益谦、黄仁周、邬恒洋、张国璋（河源人）、欧阳恩添等。在该校读了二年，因管教严格，师资优良，教学认真，学业有很大进步。尤其是杨复生老师，艰苦朴素，认真负责，好学不倦，深得学生的敬重。他假日很少回家，无论走路，或晚饭后自由活动都带着书籍，一面走路，一面阅读，已成为习惯。他的刻苦好学精神为时人称道。后来被龙川县立中学聘为文史教师，风格不改。国共两党合作后，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参加了国民党后又加入共产党。并与黄觉群、张重耳等组织龙川县农会。一九二八年春夏间，发动鹤市农民起义，失败后出走南洋亚庇埠，教书谋生。我在乐育任教时他已出走，曾到校找我借款赴香港。解放后极大欢喜，正打算回祖国工作，束装入船即得病，上岸而终，甚为可惜。一九一六年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首义讨袁，全国响应。叔父化如奉命组织民军任东江第七支队司令官，向袁氏嫡系广东都督龙济光进攻。大哥连魁任卫兵随军攻河源、惠州。民军到泰尾、水口，遇到敌人正规部队攻击。民军素无训练，而且武器低劣，不支撤退。河源、龙川相继失陷，叔父化如也走避兴梅地区。后来再回龙川重振旗鼓，转攻和平，克复和平作为根据地。当化如叔民军失败时，有反对革命的土豪劣绅，扬言政府军即来仁里村火烧化如家乡房屋。致使村人星夜扶老携幼，牵